

国外编辑出版丛书

出版概论

〔英〕斯坦利·安文 著

王纪卿 译

BIAN JI
CHUBAN

商务出版社

译者前言

这个中文译本的出版，是在亚欧十几个国家分别以其国语出版的这部著作的各种译本问世多年之后。过去六十年间在国际出版界和关心出版事业的人们当中享有极高声誉的这部经典名著，时至今日才与我国读者见面，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我们大可聊以自慰的是，目前面临着困难局面的我国出版界，正在如饥似渴地追求着本书记述的那些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宝贵的知识和经验，所以中译本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此外，这个译本诞生在较晚的时候，使它得以根据十年以前紧随时代前进步伐而在内容上多有更新的原著最新版本翻译出版，毕竟也是值得庆幸的。

当然，在热情关心这个译本的出版业同行们和译者本人看来，此书现在发行于国内，还有许多令人欣喜的益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国从事出版工作的人们，已从过去长期循规蹈矩地承袭不合理的陈旧经营框套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开始积极地探索应当如何经营本国的出版事业；而本书恰好能为这种探索提供大量新鲜的信息和珍贵的启示。这信息的新，并非因为它们刚刚发生于前天或昨天；事实上，这些信息是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之间漫长的西方出版史中陆续产生出来的。但是，我们过去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顽固地将

之屏斥于外界，使之对于我们这些闭目塞听的人一直保持着海外奇谭那样的清新度。同样，这种启示之所以珍贵，并非因为这本书包含着鲜为人知的神秘理论；事实上，本书的内容，哪怕就其最深邃的部分而言，显然是每个人都能领悟的顺乎常情的经营道理。但是，我们不久之前还习惯于遵循僵死不变之古老模式，常常失去了作出正常判断的起码理智，以至于一条闻所未闻的简单原理或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都会使我们这些曾经偏执一念的人产生茅塞顿开的感觉，并有充足的理由将其当作得之不易的锦囊妙计。何况这本书记述的丰富的事实和思想，来源于一位享誉世界的出版商所作的实践和思考，其对于我们的价值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

近年来，我国出版界被迫反思过去、怀疑现状的经营者日益增多，而出版行业各个部门积极探索改革问题的有识之士也不乏其人。这样一来，我们随时可以听到不少背逆陈词滥调的宏论高见。这些沸沸扬扬的呼喊和议论，给步履维艰的出版行业投上了希望的曙光。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高谈阔论之中，是否已有很多人正在寻究出版业赖以生存、维持和发展的基本原理，还是值得怀疑的。在这一方面，我国工商业和其它生产领域对于其经营规律的探讨，相比之下做得远为出色。对这种状况深感忧虑的本书译者高兴地看到，斯坦利·安文爵士的这部名著，在这个问题上对于我们弥补严重的缺陷大有裨益。这位已故的英国出版商当然不可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图书产品是否属于商品范畴，或者是否应该成为商品；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版业是不是工商业，或者这里的出版社是否应做出版商。但是，他的这部著作揭示了

一些更为本质的问题，即就英国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版事业盛衰成败的经验看来，从经济、文化、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诸方面支配出版业的客观规律是什么，那些国度里的优秀出版商们是如何遵循这些规律经营着切身的事业，以及这些规律将会把他们未来的发展引向何方。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在于可以藉此为自己的行业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其次可为中西比较出版学补充宝贵的研究资料。但译者还想强调一点：在本书目录所列的关于出版业全部日常工作的条目中，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其中对于我国出版业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具有根本意义的几项内容。从译者本身理解的角度而言，读者可从本书中了解的有关图书生产的成本核算和计算定价的重要原理，西方优秀出版商为了维护和发展学术著作、专业著作和各类严肃读物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出版和版权立法在出版事业中的具体运用和巨大效力，以及同现代出版业紧密相连的各种技术知识和竞争手段，都是我国出版界目前和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可资借鉴的关键内容。

由上所述，在读完此书之后，我们可以相信，作者在本书中凝聚的卓越成就，归功于他对出版业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的正确发现，归功于他对这一行业中各种经营知识的高度积累，也归功于他将上述两者运用于日常工作的不知疲倦的实践。这一切，使这位作者得以在其有生之年于英国出版界领袖群伦，并且历任国际出版商协会的会长。事实证明，他的毕生努力和他的这部著作，对于世界各国出版业的改善和发展起了指导性的作用，而且促进了并将继续有益于出版业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有趣的是，本书原版及其各种译本问世

后发挥的实际效用，远远超过了作者撰写本书的初衷和他当初的预料。它不仅象作者在本书第七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已经并将要“为（出版）这一行业以外的人们提供（有关出版的）知识”，而且成了各国出版专业人员的一种必读课本。它的日译本第三版由日本编辑学校出版部收入“编辑丛书”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此中译本初版之际，译者乐观地期待着这颗知识的良种在我国出版界和有关领域的园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并且希望这个心愿能够圆满地实现。

着手翻译此书的时候，我有幸得到了它的两种重要的外文版本，其一是作为翻译依据必不可缺的英文原著第八版，其二是布川角左卫门和美作太郎两位先生根据上述英文第八版翻译的非常出色的日文译本第三版，两者分别是英、日两种文字的最新版本。幸而又幸的是，这两种版本所用的文字，正是我在书刊翻译和译文编辑的经验中最为熟悉的两种外文。于是，我对这项工作信心倍增。如今看来，通过这两种版本的互相印证来加深对于原著的理解，确实在我对于译文准确性的追求中起了指路明灯的作用，同时为我运用本身掌握的翻译技巧提供了较大的选择余地。我想，我也许可以大胆地说，这一有利的条件使这个译本因译者水平有限而难免存在的谬误大大减少了。

除此之外，参照日译本翻译原著，使我另有收益。首先，日译者将本书原名《出版业的实况》“斗胆更易”为《出版概论》的理由，是我十分赞同的，因此我也步其后尘，选用后者作为这个译本的书名。用俗话说，这是拣了一个现成的便宜，应该感谢两位日译者对这一书名的创译。其

次，日译本刊载的译者前言及译者后记，使我得以通过又一渠道深入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专业素养，以及许多同本书有关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后记中忆述的两位日译者跟作者亲身接交的往事和日译本诞生于世的经过，使我在翻译过程中对这部著作感觉愈加亲近。第三，日译本载有大量翔实的译注，它们不仅能在极大的程度上充实中译本注释的份量，自然也能为我节省在直接作注的情况下必须花费于查据考证的许多精力。考虑到日译本的译注还能为中译本读者提供英日两国出版业在若干方面的比照，采纳这些注释的确具有方便阅读和充实材料的意义。为此，在这个中译本中，除了为数不多的作者原注和中译者注释以外，从日译本中译译过来的注释占有很大的比例。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本书作者斯坦利爵士的为出版事业奋斗毕生并且卓有建树的事迹也在我国读者心中留下更深的印象，我将日译本的译者前言和后记翻译过来，分别置于这篇前言之后和卷末。日译本中排在卷首的原书第七版作者序言和卷末附录中的“版税制出版合同的基本格式”及“实价图书协定”两个文件，是英文原书第八版中删除未用的；考虑到它们对于中国读者的参考价值，我也仿效日译者在日译本中“自作主张”的做法，将其收录于这个译本之内。至于日译者前言中有关编辑体例的说明，除了正文中〔 〕内的文字为作者继承人菲利普·安文先生补作之注释这一点同样适合于这个中译本以外，其余各项都与这个译本的编辑体例无关。

最后，我要感谢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我以热情鼓励和大力帮助的出版界同行及其他方面的朋友。特别应该提出的

是，湖南省机械工业学校的英语教员刘秋玲同志为我试译了本书的第十章；湖南医学院图书馆的章锦南同志和吉林人民出版社《日本文学》副主编李长声同志，经过颇费周折的多方查找，为我翻译此书提供了英文原书和日文译本；书海出版社的同志们，自始至终关心这个译本的生产过程，为译稿的润色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觉得它是满载着编辑的爱护和期望幸运问世的。在此，我向所有这些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恳望他们同尊敬的读者一道，对拙译的失误之处提出批评，并且不吝指正。

王纪卿

1987年5月，于长沙望月村

日译本前言

这个译本，是根据 Sir Stanley Unwin, *The Truth about Publishing*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一书第八版译出的。原书名直译为《出版业的实况》，意味着本书旨在阐述出版或者出版业的真相及其重要原理。我们的这个日文译本，斗胆更易书名，题为《出版概论》。理由在于：本书内容以图书出版为中心，阐述了出版或出版业的全貌，素称“关于整个出版业的最为浅显易懂且又最可信赖的教科书”，盛誉至今未衰；对于日本读者而言，《出版概论》这一书题，较之直译的书名，倒是更为贴切，而作者也赞成如此更改书名。

作者斯坦利·安文爵士，既是本书发行者——乔治·艾伦及安文公司的创立人，又是代表英国出版界的最有实力的出版商之一。他生于1884年，1968年以八十三岁高龄仙逝。他的一生是在出版界度过的。他在二十岁以后完成了学业，即赴德国莱比锡见习出版业务；不久返回伦敦，在安文·布拉瑟斯印刷厂体验了排字工的生活，随后在叔父费希尔·安文经营的一家书店里工作了八年。1914年，三十岁的斯坦

利·安文承袭了出版过约翰·拉斯金^①等人著作的乔治·艾伦公司，改易商号，称之为“乔治·艾伦及安文公司”，从此开始自己的出版活动。此后该公司出书范围极广，遍及学术和文艺的整个领域。它特别注重于出版现代的学术著作和讨论社会问题的影响深远的优秀进步著作。这家公司在出书方面表现出“考虑明天优先于昨天”的规划精神，同时这也表明了安文本人的信条。乔治·艾伦及安文公司已有六十六年的历史，国内海外声望卓著，评家说：“它对知识这种公共财产所作的贡献，超过了英国任何一家出版社。”（Frank Mumby, *Publishing and Bookselling*, rev.ed.1956）这要归功于本书作者诚实而顽强的努力。

斯坦利爵士不仅致力于发展他所主持的出版公司，而且为英国的出版界和读书界鞠躬尽瘁。1926年，他参加了为英国出版界的更新带来重要转机的荷兰及德国图书业视察代表团；在1933年至1935年间，他作为英国出版协会的会长，为了同业界的团结和发展，在事业中留下了大片的足迹。1934年以后，作为英国文化振兴委员会执委会的一员，作为书商协会的会长和全国图书联合会的副会长，他曾不断地进行多方面的活动。

然而，本书作者之所以成为英国出版界名传遐迩的首要人物，不单是因为他为国内出版业做出的业绩。他那建立于这份业绩之上的不知疲倦的国际活动，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他曾四次周游世界各国，欧美之行自不必说，他还曾历

^① 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著名批评家。——中译者注

访英国的各个殖民地和亚洲国家（日本和中国），详细地考察研究各国的出版状况。诚然，可想而知他在出访时也要处理图书的出口和翻译权这类实务性的问题，但这一次次出访同时也使他的视野扩大到国际的范围，并向他提出了为出版商的国际协作发挥指导作用的任务。这里所指的是，本书作者曾积极促成国际出版商协会（IPA）的建立，并于1936年至1938年间和1946年至1954年间出任该会会长。1946年，他荣获爵士（Sir）称号，又于1966年受封K.C.M.G.^①爵位，这显然也是他凭着优秀的人格和非凡的活动力长年不懈建树的业绩所带来的结果。

本书作者在如此繁忙的生活中，反复研究英国和海外各国的出版业，发表了一批著作，本书则尤为其代表作品，其中系统地汇集了作者毕生的经验，内容涉及图书出版的全部过程，具体阐述了出版业各个方面的有关问题。而且，他的论述不落平板艰涩的俗套，而是随处交织着辛辣的嘲讽和轻松的幽默，在叙事之间道出了出版业的根本精神和原理，保持了英国学术著作特有的风格。可以说，人们早就期待着出版领域里出现这样的著作，而首次的成功是非本书作者莫属的。本书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人们提到出版方面的文献，必然对它称道一番。有人将它尊奉为“出版者的圣经”

（乔纳森·凯普语），也是毫不奇怪的。所以，除此日文译本以外，本书还有德国、西班牙、瑞典、法国、丹麦、荷兰、捷克斯洛伐克、葡萄牙、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印度、意大

① 即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英国爵位之一种。——中译者注

利等十二国语言的译本。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作者为本书设定的读者对象，不单是狭义上的出版商及其雇员，还包括出版业的全体有关人员，以及从事著述的著作家，包括立志成为著作家的人们。本书卷首特意安排了“致著作者的前言”，作者意图从这里也可窥见一斑。这就是说，斯坦利爵士希望通过他的这部著作，使图书的写作——编辑——制作——销售这一包括物质、精神两个方面的复杂过程中的全部有关人员了解“出版的真实状况”。

就出版业的结构、常规、组织和水平而言，英日两国的国情显然是大不相同的。因此，本书叙述的某些事实对我国并不适应。尽管如此，读者掩卷之后大约都会认识到，使出版成其为出版的那些基本条件，使出版业作为独特的文化产业构成其经营特点的那些关键因素，超逾了相形之下显得微不足道的差异，英日两国之间在这些本质问题上存在的共同点和相似点之多，实在令人吃惊。

本书的原文第一版于1926年10月问世，1946年发行了第四版。由于作了全面的增补修订，这一版是重新排印的。此后于1947年发行了第五版，1950年发行了第六版。1958年（昭和33年），栗田书店发行了我们所译的日文本第一版，它是根据原书第六版译出的。随后，1960年又有再次经过大幅度修订的原文第七版问世，我们根据新的版本对译本作了修订，于1960年将“修订新版”交由栗田出版会以不同的开本出版。第七版增补的作者序言（第七版序言）对修订的意图作了说明，大致叙述了作者对“修订”所持的态度和观点。所以，尽管原文第八版删除了这篇序言，但我们在眼前

的这个译本里，仍然自作主张将其收于卷首。

从原书第七版问世到这个译本所依据的原书第八版诞生，经历了十六年的漫长岁月。作者本人即斯坦利·安文永别人世的重大事件（1968年），也是发生在此期间。原书第八版是在作者逝世八年以后发行的。

因此，关于第八版应以何种形式和内容与读者见面，原著者的近亲好友作了慎重的考虑，结果决定由菲利普·安文承担修订任务。菲利普不忍割舍“原作蕴含的精华与芬芳，洋溢于字里行间的不为任何自我怀疑所动摇的自信，还有作者刚劲的笔力和明晰的表述所体现的雄浑气魄，以及构成乐天主义和美好人格的一切因素”，并为本书的内容紧跟时代步伐而苦心设计，这在本书卷首的“第八版序言”中已有详述。

回想起来，从第七版发行到第八版问世的十六个年头，无论着眼于英国还是瞩目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出版界，都可以说这个时期充满了划时代的事件，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是以往各版发行以后的时期所不能相比的。菲利普顺应这种情况，在文中各处的段落之间添补新的说明，以方括弧〔 〕括之于内，又在正文中追加必需的数字和解释。此外，这一版取消了旧版中介绍照相凸版实例的插页，可能是考虑到制版印刷术已有进步，而这方面的技术入门读物并不短缺，所以有意避免重复的缘故。我们认为修订者菲利普劳苦功高，同时又觉得，第八版删去了能够反映斯坦利·安文生前那种活跃劲头的“历史性”章句，削减了一部分字里行间洋溢着坦率与诙谐并将昂扬斗志隐含不露的行文手笔，实为一大憾事。尽管删削的部分以现代的观点看来有失于切合实际，但我们仍不免为它的损失体味到一抹惆怅。幸好这损失不是无

可挽回的，因为读者可从作者的另一著作即《一个出版商的真相》（后出）一书中获得已从本书里消失的全部信息。

在翻译第八版的过程中，我们对旧版的译文作了全面的校勘，并将读之颇觉艰涩的译文，尽可能改写为流畅易懂的文字。第八版对旧版的七个附录作了调整，除保留“初版畅销小说图书的盈亏计算”外，仅仅罗列了参考文献。但是，为方便日本读者起见，我们自作主张，增补了“版税制出版合同的基本格式”和“实价图书协定”两个文件。

注释部分也需要作一些说明。除以·号标示作者原注之外，我们将译注或插于正文之内，首尾加上方括弧〔〕；或在被释正文的右侧标上注码（1）、（2）、（3）……；并置注文于各段之末。我们还根据近十年来获得的新资料对译注作了修补。因此可以说，这个日译本在既已流传于世的各种文字的版本中，是内容最新的译本。

关于本书初版翻译出版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日译本第三版的出书经过，留待于卷末的“译者后记”中记述。

近十年间，我国出版界有了显著的发展。随着出版事业的进步，人们现在关心出版和出版研究的程度也在大幅度增长。出版业各部门涌现了大量言论和著述。虽然这都是可喜的现象，但还有一项工作尚待完成。现在似乎还没有一个老练的行家对“出版”的各个方面做出系统而又实证的总结。因此我们认为，《出版概论》的这个新版本，比它的第一个版本具有更大更深远的意义。

我们希望，这个译本不仅将有益于我国的出版人员，而且将影响读书、著作等各方面与图书有缘的众多读者，成为他们的入门向导，从而让作者的夙愿存活于我国的读者群

中。这一愿望倘能实现，作为译者，我们将甚觉荣幸，并将得以分享本书作者的巨大喜悦。

布川角左卫门

美作太郎

1980年秋天

补 记

关于本书作者斯坦利·安文爵士的详细经历，请参阅与本书第七版同时问世的作者自传：*The Truth about a Publisher*,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此外，本书作者还曾发表下列著作：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9)

The Price of Books (1925)

Book Trade Organization in Norway and Sweden
(1932)

The Book in the Trading (1932)

Book Trade Organization in Denmark (1937)

Best Sellers, are they Born or Made? (1939)

The Status of Books (1942)

Publishing in Peace and War (1944)

On Translations (1946)

How Governments Treat Books (1950)

与人合著的有：

Two Young Men See the World, by Stanley
Unwin and Severn Storr (1934)

编著的则有：

The Work of V.A.D. London (1920)

第七版序言

我于1904年1月跨入图书业的大门。从那时到现在，出版界发生了沧桑巨变。其实何须远溯，仅在1926年本书初版以后，出版界的变化就足以令人瞪目了。当时的出版商们倘能重操旧业，见到当代出版业的纷繁景象，恐怕会咋舌不已。他们面临的不复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行当，而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行业。无穷无尽的帐表簿记，漫无限度的行政约束，会使他们目瞪口呆。当他们看到，职员们遵照各家行政当局的命令，从事大量无偿的劳动，其中包括过去闻所未闻的工作，他们简直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与此相比，图书业中心由帕特诺斯特·罗^①向大英博物馆近邻的西移，甚至出版业的西方化^②和人们对于畅销书的崇拜，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了，尽管科学艺术商品化的某些方面，在他们看来并不顺眼。

① Paternoster Row，出版社和书店云集的伦敦东部街道。二次大战中毁于纳粹空袭，这一中心后来向西转移。（参见S. Uwin, *The Truth about a Publisher*, p.310, Frank Swinnerton, *Bookman's London*, Pall Mall, 1951, p.20）。——日译者注

② 即美国化。——日译者注

他们也许不会爽快地承认，如今的图书业已经有效地组织起来，取代了以前那种散沙一盘的状况；但我希望他们能够承认：活版印刷术已经改良，书籍封面辉色大增，翻译水平已提高。

在此第七版中所作的最为重要的修改，归因于伯尔尼公约的布鲁塞尔修订案，国际版权法，1956年的英国版权法，新的美国版权法，1952年的损害名誉法（the Defamation Act），1956年的限制贸易行为法（the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Act），市场供应条件及市场状况的变化，以及图书生产新工艺的问世。图书业在过去的十年里受到立法活动的强烈影响，历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时期是很少见的。幸运的是，这些影响一般而言都是有益的。

图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日益广泛的承认，图书的地位也在相应提高，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我们所遇到的许多难题，就是因为图书所受的待遇等同于“一般商品”。甚至在今天，这种情况仍给“自由的书流”设置了许多顽固的障碍。正是为了清除这些障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出版商协会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我们常听人说：“出版商要是继续出版大量没有价值的图书，就没有资格得到尊重。”于是我想提个问题：什么是没有价值的图书？少数的聪明人（检查官更不必说了），究竟有没有权利，把他们对图书所作的是非判断，强加给不如他们那般聪明甚或无知的多数人呢？

众所周知，“利于甲者未必利于乙”。一样东西对甲而言是贵重的，对乙而言却毫无价值，难道是不可能的么？各人为自己选择精神食粮，何以见得不是最好的办法呢？有些

自信的官员关心我们日常的饮食，他们很乐意开一张精确的处方，为我们规定含有 2700 卡热量或者其它营养的食物。从理论上说，这种做法对我们甚至可谓好事一桩；然而实际上我们无不承认，各人择其所好是可喜而又必要的。

对出版商不满的人们，若能抽空看一看出版物的版权记载^①，对这个问题就能洞若观火了。幸好大部分的英国图书现在仍由德高望重的出版商负责生产。如果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图书生产”一词，那么根据计算，图书用纸消费量的百分之七十，都是用于出版教育类图书。这一大宗产品，其中大部分完全不为大众知晓。事实上，一些重要的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物，除了中小学师生或者大学师生，谁也没有读过。但是谁会建议我们光读那些纯粹只有教育价值的图书呢？就连已故巴尔弗伯爵^②那样出类拔萃的才子，也感到有必要享受精神娱乐。这种娱乐自然是不拘形式的，未必要象那位伯爵一样定时阅读侦探小说。我想就连吹毛求疵的检查官也会承认，优质的娱乐读物或逃避现实的作品，在出版物中占据20%的

① 原文 imprint 与我国的“版权记载”一词类同。以英国为首，欧美各国的出版物通常将作者名、出版社名、出版地名、出版年月、出版和印刷次数等事项记于扉页或其前后。日本的出版物一般把这些事项记于书籍的“底页”。在我国出版物中，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日译本将 imprint 一词译作“刊记”。——中译者注

② Arthur James Balfour, 1st Earl of (1848~1930)，英国政治家，1902年至1905年间任首相，一次大战中曾任海军大臣。哲学造诣颇深，著作有 *A Defence of Philosophic Doubt* (1879) 等书。——日译者注